

守边卫国的古代循吏

□ 石志刚



古代循吏强调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他们在外敌入侵之际，挺身而出，竭尽自己的谋略才华，用英武的气概统率大军，迎接挑战，最终成功维护了边疆安全。

主动出击的张仁愿

公元706年，唐代名臣张仁愿被唐中宗任命为朔方军总管，率领唐朝部队抵御侵入唐朝宁夏地域的东突厥默嘎可汗。当时，抢占了陇右牧马万余匹之后的默嘎部队正在北撤。张仁愿率唐朝部队一路紧随北撤的默嘎部队，攻破突厥之众，夺回被掠夺的马匹和财物。为了解除东突厥经常侵入唐朝国境的祸患，708年，默嘎率其部队击西，张仁愿趁此机会，向朝廷建议沿黄河北岸筑三座受降城，以防御东突厥，进一步有效巩固边防安全。当时，虽然朝中大臣认为此举会兴师动众、劳而无功，唐中宗却希望借此机会能够彻底解除北部边患，就同意了张仁愿的建议。

张仁愿在默嘎部队返回漠南之地之前，加紧施工、督促工事，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将三座受降城修好，分别是东受降城托克托，中受降城包头西南的拂云祠，西受降城五原，三座受降城各相距四百余里。三座受降城占据黄河北岸的险要之地，遥相呼应，构成一道坚固的防御屏障。在营建三座受降城过程中，亦展示出他出众的军事战略能力。他一反常规，没有在受降城修筑防御建筑。当有人质疑他没有城防设施时，他的回答是：“兵贵攻取，贱退守。寇至，当拼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斩，何事守备，退沮其心哉！”百姓敬佩他御敌千里之外的英雄气概。张仁愿在三座受降城之北挖地三百余里，设置一千八百所烽火台，雨大有敌情，便燃烽烟报警。三座受降城和烽火台的建成，挡住了东突厥南犯的去路，“自是突厥不敢渡山败牧，朔方无复寇掠”。张仁愿守边卫国，为大唐百姓带来了和平与安乐。在他去世后，边疆人民在受降城为他立祠，表达对他深深的追思和怀念。

锁钥名将戚继光

明代戚继光在抗南倭、北虏过程中建立了很大功勋。其中，北虏指的是经常侵扰北部边镇的蒙古诸部，他们虽然接受朝廷封号，但是所从事的抢劫财物的行为直接影响边疆地区百姓的生产生活安全。北方蒙古诸部中最为强悍的俺答，随着实力的增大，不断骚扰北部边境，其烧杀劫掠，导致北部边疆人民遭受巨大灾难，“膏腴之地，弃而不耕，屯田荒芜，盐法阻坏”。1567年，俺答再犯北部边疆，京城名臣呼吁调戚继光镇守北边。1568年，戚继光来到蓟门镇守北疆。戚继光到了蓟门后，发现当地士兵不熟悉战事，纪律不严，队伍不整，没有正确的军事操练方法，便上疏朝廷，调遣浙兵北上蓟门，助他一臂之力。皇帝批准了戚继光的建议。随后，“浙兵三千人至”“陈郊外”，恰逢大雨，但是浙兵站在郊外一动不动，“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在浙兵的引领示范之下，戚继光在蓟门的军事演练才有了质量保证。

戚继光在蓟门修建敌台，每座敌台都是一座坚固的堡垒：“空心台以上临下，用火器、佛郎机、子母炮更番击打。”当时的军事守备可以说是非常强大了。部队战斗力的提升和军事设施的完善，增强了戚继光守卫北部边疆的决心。强大的国防实力，促成了俺答与明朝的交好，同时，回击了其他土蛮的骚扰。“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戚继光离开蓟门后，他在蓟门的军事思想得以被人继承，“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戚继光守卫北疆，为北疆和平稳定的秩序构建奠定了基础。明朝开放北部部分城市与蒙古各部进行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升平景象、幸福安康生活得以再现。



一身正气的唐代宰相戴胄

□ 刘立祥

戴胄（出生年月不详—633年），字玄胤，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唐太宗朝宰相。戴胄早年为隋朝官员，曾效力于王世充，后归唐，历任秦王府士曹参军、大理少卿、尚书左丞、谏议大夫、民部尚书、吏部尚书、宰相等职，进爵武昌郡公。戴胄正气凛然、不惧生死、持身中正敢说“不”的仁者风范，彪炳青史，光耀千秋。

正气凛然，向太尉说“不”

戴胄原为隋炀帝朝官员，曾任门下录事，为人刚直正直，办事干练，通晓律法，娴于文案。虽官秩不显，却享有盛誉，特别是纳言苏威、黄门侍郎裴矩等，都对他赞赏有加。

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隋炀帝杨广在江都被叛军缢杀。消息传到洛阳，群臣莫不惊遽色变，大臣元文都、王世充、段达等拥立杨广之孙越王杨侗继位，年号皇泰，史称皇泰主，戴胄被任命为给事郎。

杨侗虽被拥立为皇帝，但终究是个只有14岁的孩子，其时，群雄逐鹿，遍地烽烟，朝廷所能稳定控制的区域只有一个洛阳城。皇帝幼弱，政局翻覆，城头变幻大王旗，天下乱成一锅粥，手握重兵的王世充自然成了专擅朝政的铁腕人物。元文都等一伙儿文臣早就窥破了王世充的忤逆不臣之心，暗中谋划将其铲除，不慎事泄，反被王世充抢先下手，将元文都等一一诛杀，血溅朝堂。

洛阳城笼罩在一片恐怖的阴霾之中。

诛杀了元文都等大臣，王世充愈加气焰嚣张，横行无忌，逼迫皇泰主任命其为太尉、开府仪同三司，独揽朝政，一手遮天，其图谋篡位的野心已是路人皆知。

面对杀气腾腾不可一世的王世充，群臣莫不畏惧震悚，三缄其口。毕竟，元文都等血染朝堂，鉴鉴不远。作为王世充属下官员的戴胄却不管这一套，他偏要与虎谋皮，劝谏王世充说：“君臣大分均父子，休戚同之。公当社稷之分，与存与亡，正在今日。愿尊辅王室，拟伊、周以幸天下。”

王世充虚与委蛇，也算给足了戴胄面子。

没成想戴胄竟“蹬鼻子上脸”，

持法公正，向宰相说“不”

到了唐武德四年（621年），秦王李世民攻克虎牢关，戴胄被引入秦王府任士曹参军。

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不久，继位为帝，是为唐太宗。戴胄被任命为兵部郎中，封武昌县男。

贞观元年（627年），大理寺少卿出缺，派谁去继任这个主掌全国案狱审理的职务呢？唐太宗首先想到了一向公正无私、办事持重练达的戴胄，对左右说道：“大理，人命所系，曹清直，其人哉。”于是，任命戴胄为大理少卿。

戴胄走马上任。没过几天，便与宰相封德彝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某日，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应召入朝觐见，一时忙乱，没有解下佩刀就径直走进通往内宫的东上阁门，走过阁门后，监门校尉才发觉。

当时朝廷律文规定：内侍人员不得持刀刃入上阁，违者斩。按照这条规定，长孙无忌无意间犯下了死罪，与此相关的监门校尉也罪在不赦。

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胞兄，又在玄武门之变中立有大功，唐太宗倚为股肱。究竟应当如何处理这一事件，朝臣们莫衷一是。

宰相封德彝判定：长孙无忌误带佩刀入宫，属过失犯罪，罚铜20斤；监门校尉履职疏忽，失职犯罪，判处死刑。

唐太宗竟同意了这种裁决，将案子发付大理寺审核结案。

戴胄挺身而出，大声说“不”。他上奏太宗说：“按照法律规定：供奉皇帝的汤药、饮食、舟船，一旦发生任何差错，都要判处死罪。长孙无忌带刀入宫，监门校尉没有发觉，这对双方来说同属犯罪，现在一个仅仅判处罚铜20斤，一个则判

处死罪，同罪不同罚，显然有失公允。如果陛下因长孙无忌有功而从宽处理，这不是司法机关可以议定的；如果要依法处理，那么这样判决就亵渎了法律的公平。”唐太宗听了戴胄的奏议顿改初衷，说道：“法为天下公，朕安得阿亲戚？”于是，降诏重新审议。

宰相封德彝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唐太宗默然良久，想顺水推舟。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点，戴胄甚为窝火，又上奏太宗辩驳说：“不然。校尉缘无忌以致罪，法当轻；若皆误，不得独死。”

唐太宗深为戴胄的刚正不阿和执法持平的态度所感动，遂赦免了校尉的死罪。

立信天下，向皇帝说“不”

唐太宗励精图治，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知人善任，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将大批德劬才高之辈遴选到显耀岗位。有些人为了搭上顺风船，登上进阶梯，竟伪造身份资历，篡改谱牒。针对这种情况，唐太宗特地下诏，请作伪者主动自首，凡作伪又不自首者，一经查出，以死罪论处。

不久，有一位官员被查出伪造资历。戴胄受命审理此案，依法判处此人流放。

唐太宗闻之勃然大怒，当面斥责戴胄说：“我早有诏令明示天下，作伪不自首者处死，你偏偏跟我作对，当判死刑流放，这不明明是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毫不示弱：“陛下如果直接下诏将此人处死，臣自然管不了。陛下既然将他交付法司，臣敢违背法律吗？”

唐太宗更加火冒三丈：“你只顾自己遵守什么法律，却让我失信于天下，这合适吗？”戴胄见太宗动怒，放缓了语气说：“法律是国家为布信天下而制定的行为规范，言语是由一时喜怒而信口说出来的。陛下凭借一时忿怒而杀人，其实心里也清楚这样做非常不妥，故而交给臣下依法论处，这叫作忍小忿而存大信。如果屈从个人一时喜怒，亵渎法律的尊严，失信于天下，臣为陛下感到惋惜。”

一番肺腑之言使唐太宗幡然醒悟，于是欣然采纳戴胄的意见，微笑着对戴胄说：“我在法律上每有失误，你都能及时予以纠正，我也就没

什么忧虑了。”

戴胄屡屡廷争面折，“参处法意，至析秋毫，随类指摘，言若泉涌，帝益重之。迁尚书左丞。矜其贫，特诏赐钱十万。”

贞观四年（630年），戴胄升任宰相，进爵武昌郡公。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颁旨重修洛阳宫殿。戴胄进谏道：“现在关中、河西都在扩充军队，前不久刚刚启动了修复九成宫工程，丁壮被役使殆尽。如今战乱平息不久，民间人口遽减，一人为役丁，全家农事荒废，老幼尽力劳作，也难以维持生计。况且，自七月以来，淫雨不止，江河泛滥成灾，今年年景如何，尚未可知，此时再大兴土木，我担心会引起百姓的怨恨。今宫殿足以庇风雨，也足以住得下卫队仪仗，过几年再重修洛阳宫殿，尚为时未晚，何必一定要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扰民添乱呢？”

唐太宗闻奏，大为赞许，遂罢重修洛阳宫殿之议。“太宗甚嘉之，因谓侍臣曰：‘戴胄于我无骨肉之亲，但以忠直力行，情深体国，事有机要，无不以闻。所进官爵，以酬厥诚耳。’”

贞观七年（633年），戴胄病逝。唐太宗罢朝三日，追赠戴胄为尚书右仆射、道国公，赐谥号为忠，命虞世南为他撰写碑文。唐太宗见戴胄身后家无余财，宅第简陋狭小，以致祭享无所，诏令有关部门为之建庙祭祀。

读《新唐书·戴胄列传》，恍觉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从字里行间昂然奋起：面对手握屠刀的太尉王世充，他大声说“不”；面对阿谀权贵徇情枉法的宰相封德彝，他大声说“不”；面对当朝皇帝唐太宗李世民，他依旧大声说“不”。持身中正，不惧生死，该说不时则说“不”，是戴胄一生宦海沉浮为官理政的鲜明特色。没有信守正义、嫉恶如仇的价值追求，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情怀，没有“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坚守与自信，没有即使被杀头也毫不含糊的决绝与执著，这个“不”字是无论如何说不出口的。

人物志

从清代新疆的民族分布看，在清朝统一新疆之前，北疆地区主要为蒙古古人（即明代瓦剌人、清代卫拉特人）的居住地，主要生产方式为游牧；南疆地区主要为维吾尔族的居住地，主要生产方式为农耕。在南疆和北疆之外，还有一个独特的东疆区域，即哈密一带。很难将哈密单纯划分为南疆或北疆。张穆在《蒙古游牧记》里这样形容哈密：“南通吐鲁番，为天山南路之咽喉，北通巴里坤，为天山北路之冲要。”哈密地处南疆和北疆的交汇处，为南疆北疆的通衢。终清之世，哈密回部首领始终忠于清朝。在清代的史料中，“回部”一词多指新疆维吾尔族聚集区。

哈密归附清朝与噶尔丹有什么关系

哈密一带早在西汉时即已纳入中原政权统治，彼时西汉称哈密一带为伊吾卢。西汉之后，东汉、北魏、隋朝、唐朝、元朝、明朝等朝代皆统治过哈密地区。明朝后期，因国力衰弱，明朝放弃了在哈密的统治，明朝的西北边疆萎缩到嘉峪关内外一带。明清鼎革之后，清朝入关后的前四十年，清廷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南方，即顺治朝时灭亡了大顺、大西和南明，康熙十二年至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就在清朝忙于平定三藩之乱的时候，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逐渐统一了漠西蒙古地区，哈密回部亦为噶尔丹所控制。

漠西蒙古势力的东移，不可避免地同清朝的甘肃地区产生了联系。康熙二十九年，侵入漠南地区的噶尔丹军在乌兰布统草原同清朝的八旗精锐相遇，之后大败而归。康熙三十五年，清军在昭莫多获得大捷，噶尔丹元气大伤，无力再威胁清朝的北部边疆。彼时，噶尔丹陷入极端困境，东有步步紧逼的清军，西有其侄策妄阿拉布坦占据漠西蒙古腹地，噶尔丹进退失据，不得不依靠哈密回部的贡赋来维持生活。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疲于供应赋役的哈密回部开始摆脱漠西蒙古的控制，决定归附清朝。康熙三十六年，哈密回部首领额贝都拉抓到噶尔丹子色布腾巴勒珠尔，将其献给清廷，希望哈密能纳入清朝统治，故康熙三十六年，哈密“其地始内属”，成为清朝疆域的一部分。此后，一直到清末，哈密回部始终在清朝版图之内。

从康熙三十六年额贝都拉归附清朝，直到清末，哈密首领一直由额贝都拉及其后裔担任，先后有额贝都拉、郭帕伯克、额敏、玉素卜、伊萨克、额尔德锡尔、伯锡尔、卖哈莫特、沙木胡索特九任首领。从清前期到清后期，哈密首领的爵位也逐步升格，爵位从第一代首领额贝都拉时的札萨克一等达尔汗，逐步升为伯锡尔时的亲王。

清代哈密回部有哪些独特之处

综观整个清代，哈密始终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首先，哈密回部是第一个归附清朝的维吾尔部众，康熙三十六年即已归附。哈密归附清朝有什么样的意义？一方面，清朝疆域拓展了，哈密从漠西蒙古进攻清朝的桥头堡变成了清朝防御漠西蒙古的前沿；另一方面，哈密归附后，清朝善加安抚，树立了清朝在西域统治的样板，增强了清朝对其他维吾尔部众的吸引力和向心力。正如哈密首领额贝都拉所言：“给臣敕印，俾有恃以无恐，以保我疆土，且使叶尔钦、吐鲁番等闻之，必共欣慕，各思向往。”此后吐鲁番归附清朝，亦或多或少受到了哈密的影响。其次，哈密回部在清朝所有回部中地位最高。清朝在哈密没有实行伯克制，而是参照蒙古设立了扎萨克旗，而扎萨克旗的自治权要多于伯克制，体现了哈密回部的独特地位。同时，哈密回部首领是所有回部首领中唯一一个晋封亲王的首领，地位不可谓不高。哈密回部备受重视，一是源于哈密回部是主动归附清朝的，正如额贝都拉所言：“我诚附天朝非迫而然也。”也因此，清朝皇帝对哈密回部另眼相待、更加重视。二是源于该部一直忠于清朝，甚至该部第七代首领伯锡尔因帮助清朝恢复新疆而罹难。同治六年，清朝“赠哈密殉难札萨克郡王伯锡尔亲王，建立专祠”。

哈密首领为何始终忠于清朝

哈密忠于清朝，历史渊源和“德”的因素十分重要。

清代唯一的维吾尔人亲王

□ 邓涛

首先，源于哈密地区同中原的历史联系。且不论汉唐时期，即便是明代，明廷亦曾在哈密封王设卫，关于明代哈密的历史，清代哈密首领是知道的。正如哈密首领额贝都拉所言，“臣白帽族，贡中国（中原）久”，强调了哈密同中原的历史联系，这是哈密决定归附清朝的重要原因。

其次，源于清朝君臣以德待之。如康熙三十二年，昭武将军郎谈上疏建议攻击哈密，以免哈密成为噶尔丹的后勤基地，但康熙帝认为事关重大，不可妄行，后又认为哈密为噶尔丹供赋是身不由己、其情可怜，故放弃了对哈密用兵，并让俘虏返回哈密宣传清朝的宽容政策。正因为康熙帝未对哈密采取强硬政策，才有康熙三十六年哈密回部的主动示好和归附。

再次，源于清朝皇帝对哈密首领的培养。乾隆三十七年，乾隆帝命哈密首领伊萨克赴伊犁学习处理政务和军务，提到伊萨克“可写蒙古文折子，伊亦会说满洲话”，伊萨克满蒙维三语兼通，且有具奏权，表明其无须翻译即可同乾隆帝顺畅沟通，有利于增强其在清帝心中的亲密度。第七代哈密首领伯锡尔甚至略通汉语，末代哈密首领沙木胡索特亦有一定的汉语水平，曾给自己取汉名“西屏”，即中原的西北屏藩之意。语言上的培养和文化上的浸染，增强了哈密首领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和对中原文化的接纳度。

哈密首领如何帮助清朝管理新疆

哈密首领是维吾尔人，且哈密地处甘肃和新疆之间，故哈密首领是清朝经略新疆的重要依托。

首先是哈密首领直接领兵配合清军作战。如雍正十年，漠西蒙古兵侵袭清朝统治下的哈密，“额敏敏恒卒设伏城外御之”。其次，哈密首领利用身份和语言优势、协助清朝管理新疆。乾隆二十三年，清朝在进军南疆过程中，哈密首领负责协助管理新统一的回城并安抚维吾尔群众，正如乾隆帝所言：“前因额敏和卓、玉素卜皆回部旧人，若令伊等更替驻札办事，于新疆有益。”再次，捐资助饷，为清军提供后勤支持。清朝在经略新疆时，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粮草供应，一旦新疆出现突发事件，清朝从内地运输粮草往往缓不救急。哈密为内地通往新疆的要道和通衢，且该地有一定的回屯，故终清一朝，哈密首领为清朝绥定新疆提供了重要支援。康熙五十四年，漠西蒙古出兵侵袭哈密，哈密首领额敏敏即率回众在塔勒纳沁地区屯田，并以所收青稞助清朝军饷。咸丰十年，伯锡尔因输捐饷银一万两，咸丰帝“著加恩赏用紫缰，并在御前行走”。

也正是因为哈密首领始终忠于清朝，故清朝统治者给予了哈密首领更高的政治地位和更多的自治权力。到清末时，新疆回部中仅有哈密首领保留了王爵，且为亲王爵。

